



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蔡和森、恽代英等既是上海大学的教师、五卅运动的领导人，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又都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五卅运动爆发时，瞿秋白、邓中夏虽已先后离开上海大学，但由于他们熟悉和了解学校，因而仍然能以党的领导人身份来实际指挥上海大学师生投身五卅运动。蔡和森率先在党中央会议上提出“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主张1925年5月30日在租界组织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党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

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的师生充当了主力和先锋，有400多名学生组织了38个演讲组，在参加示威游行和参加演讲方面，都成为人数最多的学校。在要求老闸捕房释放被捕学生的队伍中，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一直冲在最前列，是第一个被英国巡捕开枪轰击的中国爱国学生，最后英勇牺牲。据他的同学阳翰笙回忆：当时英国巡捕用枪对准他，逼他后退；但他很坚决，说不把被捕学生叫出来，绝不后退。

在参加示威游行之前，上海大学组织了通讯队、救护队和敢死队。上海大学女学生丁郁和黄胤都参加了敢死队。丁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5月29日写下了绝命书：“我死了，请告诉我妈妈一声。”第二天，她将绝命书放在床上就出发了。在整个五卅运动中，公共租界巡捕房抓捕了大批学生，上海大学又是被捕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学校。阳翰笙回忆说“‘五卅’运动时几乎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了”，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五卅运动爆发于上海，其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许多遭到开除，其中江苏南通、安徽南陵等地被迫离校学生多达一两百人。各地失学青年给上海大学来函，要求免试转学。上海大学支持了这些学生，让他们免试进入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其中就包括安徽学生运动领袖王稼祥。他于1925年8月底来到上海，进入上大附中高三继续他的学业，后来成为中共的卓越领导人。

在创立上海总工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罢”

斗争、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五卅惨案真相的过程中，上海大学师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的校名经常出现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上，英国时任首相张伯伦经常发表讲话诬蔑上海大学。1926年，荷兰、英国等组成的关于五卅惨案的“沪案重审三国委员会”的报告中也多次提到上海大学。诚如上海大学学生周启新所说：上海大学“震惊中外，进而成为全国反帝民族运动的中心”。

1933年1月出版的《上海周报·教育史料》第6期刊登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五卅惨案，表面上固是上海八十万劳苦同胞直接向帝国主义者进攻的一幕，实际上能站在最前线的工作同志，可敬可爱的上大学生，确有不可磨灭的助力。上大是中国唯一接受党的熏陶的学校，绝非其他各大学们所可比拟的。……所以首先为国捐躯死于南京路的何秉彝，是上大的学生。领导各队到租界上演讲的多数队长，是上大的学生。捕房拘押援助罢工的大部分人员，亦是上大的学生。五卅时代的上大，上大的影响五卅，中国虽大，实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北有五卅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时期的上大。”这是当时社会对上海大学的评价。时任上海大学教授的陈望上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中共干部的养成所”“五卅运动的策源地”。

